

从克制到介入：大国博弈下欧盟涉台政策的转向

何达霁

摘要：2017 年以来，欧盟涉台政策逐渐由战略克制转向战略介入。虽仍坚持传统“一中政策”框架，但又不断强化对台湾地区的所谓“价值支持”与“实质互动”，推动涉台政策“安全化”，加紧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联动”。与此同时，欧洲议会政策表达趋于激进，个别国家甚至成为“挺台急先锋”。究其原因，欧盟涉台政策的变化，是大国博弈下地缘政治变化、中欧结构性利益冲突以及欧洲内部政治极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变化不仅使欧盟的一个中国原则遭遇边缘侵蚀与磨损，还向民进党当局释放了错误信号，在欧洲乃至国际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不利于台海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欧盟；台湾；大国博弈；战略介入

作者简介：何达霁，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2023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盟涉台政策变化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3BGJ088）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822.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5）03-0076-14

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台湾问题中的大国因素趋于复杂化。除传统的美日因素外，欧盟因素也日益显现。2021 年 9 月，欧盟在印太战略报告中首次公开表达对台湾问题的关切；此后，又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中频频传达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政策诉求。2022 年，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与加强和台湾地区的合作并不冲突；2024 年，连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施政纲领中宣称，要在台湾问题上阻止中国以军事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可见，欧盟的涉台政策正处于进一步变化之中。鉴于欧盟是当前影响台湾问题的重要国际因素，本文尝试对 2017 年大国关系变化以来的欧盟涉台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大国博弈深化下欧盟涉台政策的转变、动因及其影响，以期对学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欧盟传统涉台政策的内容与特点

自 1975 年与中国建交以来，欧盟建立了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政治基础的“一中政策”框架。这一政策框架明确界定了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政策边界，在 2017 年以前的政策实践中表现出稳定、克制与协同的特征，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

（一）欧盟传统涉台政策的“一中政策”框架

20世纪70年代中欧正式建交之时，欧盟即在台湾问题上明确阐述其原则性立场，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欧盟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变的基础上，逐步升高对台海局势的安全关切，开始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政策诉求，进而形成“一点四面”的“一中政策”框架。“一点”系指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政治基点；“四面”则指的是：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2、承诺不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3、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4、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这也构成了欧盟涉台政策的四个要点。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是“一中框架”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体现，亦是衡量欧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标志性指标。

1.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欧盟的前身是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于1975年。1975年5月8日，欧共体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欧已就建立正式关系达成协议，并对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我向部长（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表示，所有共同体成员国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接受的立场。根据这些立场，我确认，正如欧共体发言人4月30日在布鲁塞尔所述，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台湾不保持任何正式关系或达成任何协议。”^[1]这段建交声明清晰显示中欧建交之时，即是欧盟一个中国原则确立之时。正是在这一原则基础上，欧共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承诺不与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官方关系，这也是欧盟在台湾问题上最初的政策表述。此后，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例如，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分裂主张后，欧盟随即发表声明，表明欧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the principle of “One China”）。^[2]2001年第4届“欧盟—中国峰会”后，欧盟首次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写入联合声明，次年的第5届峰会中继续沿用这一表述。^[3]尽管自2003年第6届中欧峰会开始，欧盟开始改用“一个中国政策”的涉台表述，但欧盟的涉台政策并没有脱离一个中国原则的本质，因为在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表述中仍旧强调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承诺不与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官方关系的政策立场。

2. 承诺不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不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是中欧建交的政治前提，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标尺。早在1973年10月，为推动中欧建交进程，欧共体主动终止与台湾地区的“棉纺织品贸易协议”，为中欧建交扫清障碍。1975年中欧建交时，欧方更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同时承诺不与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官方关系。此后，欧盟一直秉持这一政策立场，强调仅与台湾地区保持非官方的经济和社会交流与往来。例如2003年欧盟委员会的政策文件“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的

[1] Francis Snyde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1949—2008: Basic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North America: Hart Publishing, 2009, p.44.

[2]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cy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Taiwan,” July 20, 1999, https://aeci.pitt.edu/55196/1/cpr_444.pdf.

[3] Francis Snyde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1949—2008: Basic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North America: Hart Publishing, 2009, p.673.

共同利益和挑战”(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明确表示, 欧盟只会在“一中政策”下加强与台湾在“非政治领域”的联系。即使 2017 年以来欧盟涉台政策出现调整, 欧盟官方的这一政策立场亦未发生变化。2023 年 4 月, 在冯德莱恩访华后,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娜比拉·马斯拉利(Nabila Massrali)表示, 欧盟的涉台政策非常明确且没有改变, 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这意味着欧盟会继续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友好关系并深化合作却不会有外交承认。^[1]由此可见,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欧盟都坚持不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 并将其作为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内涵。

3. 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初, 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正式生效, 欧盟正式成立。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变局下, 虽然欧盟将发展中欧关系作为优先事项, 但受对华价值观外交的影响, 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述增加了新的内容, 即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和不与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官方关系的政策立场上, 开始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诉求。如 1998 年, 欧共体委员会发布“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 通讯时表达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 称与中国的建设性接触应成为欧盟一项关键的政策优先事项, 同时在台湾问题上表示“欢迎为推进和平和解进程而采取的任何步骤”。^[2]其后, 这一政策主张成为欧盟重要的涉台政策立场。2017 年以前, 在历届中欧峰会发表的声明中, 凡是涉台表述, 欧盟官方大多声明“希望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4. 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进入 21 世纪, 随着台海局势日趋复杂, 欧盟逐渐将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纳入其政策议程,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成为了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另一重要政策诉求。2006 年, 欧盟发布重要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 更紧密的合作伙伴, 日益增长的责任”, 开篇即表示, “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对欧盟关系重大”,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措施”“强烈反对使用武力”“鼓励务实的解决办法和建立信任措施”“支持各方之间的对话”“继续与台湾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等五要素。^[3]次年, 欧盟理事会发布《欧盟对东亚地区的外交暨安全政策纲领》(Guidelines on the EU'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 再次重申上述立场, 强调“维护两岸的和平与稳定与欧盟有着重大利害关系”。^[4]欧盟“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诉求的提出显示了欧盟对台海安全局势现实关切的上升。

(二) 欧盟传统涉台政策的特点

在传统的“一中政策”框架下, 欧盟在台湾问题上展现出明确而相对稳定的政策立场, 体

[1] “EU's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Doesn't Imply Possible Diplomatic Recognition: Commission,” April 14, 2023, <https://www.uniindia.com/eu-s-cooperation-with-taiwan-doesn-t-imply-possible-diplomatic-recognition-commission/world/news/2953570.html>.

[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 March 25, 199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1998DC0181>.

[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China: Closer Partners,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 October 24, 2006,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673f07ad-27c0-48d6-9a76-d7c0155c0b2a/language-en>.

[4]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Guidelines on the EU'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misc/97842.pdf.

现出政策的稳定性、克制性和内部协同性，这使得欧盟的涉台政策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同时降低了中欧关系发展中台湾问题的敏感性。

1. 立场明确、政策清晰。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欧盟在台湾问题上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不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等制度安排强化该立场的对外表达。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欧盟在涉台政策上拓展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两个政策面向，但始终未偏离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立场。在历次对华政策文件与中欧峰会联合声明中，“坚持一个中国”和“不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的表述被反复确认，构成其处理台湾问题的政治基础，展现出政策的高清晰度。

2. 战略克制、反应低调。中欧建交以来，由于地缘战略的限制和规避中欧关系发展风险的考量，欧盟在台湾问题上整体保持战略克制。不同于美国的战略嵌入和政治干预，2017 年以前欧盟始终未将台湾问题纳入其政策议程和战略范畴。尽管 21 世纪初，欧盟在涉及台海安全局势时强调“鼓励对话”“避免武力”等立场，但并未展现出介入台湾问题的政策意图。这种战略克制使得欧盟在处理台湾问题时表现低调，即便在个别时间点对台海局势表达关切，也多停留于有限的口头宣示。

3. 内部协同、政策一致。在欧盟治理框架中，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三大机构虽职能各异，但在台湾问题上长期保持基本协同。2017 年以前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主导着涉台政策的核心表达，语调谨慎；欧洲议会虽曾在个别决议中表达对所谓台湾“民主”的支持，并主张深化与台湾地区的交流，但整体上并未越界挑战欧盟行政与决策部门的涉台政策主轴，其涉台表述多附带“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性前提，显示出欧盟内部立场的基本协调。同样地，欧盟成员国亦普遍尊重欧盟层面的涉台政策，在台湾问题上未出现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和行为，这种内部协同和政策一致使得欧盟涉台政策长期处于低张力和低敏感度运行状态，台湾问题中的欧盟因素并不凸显。

二、大国博弈下欧盟涉台政策的变化及特点

2017 年以来，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为标志，国际政治转向大国竞争，大国博弈持续深化。在这一新的国际背景下，欧盟对华战略逐渐发生转变，其涉台政策亦随之调整，逐渐展现出以下变化特点。

（一）在“一中政策”框架下强化对台湾地区的“价值支持”与“实质互动”，涉台政策逐渐呈现“两面性”

2017 年以前欧盟涉台政策保持战略克制，遵循“一中框架”下的政策惯例，表现出较强的政治自律与政策稳定性，其对台互动主要限于经贸、人文交流等非政治领域，在政策表述上亦始终保持谨慎。尽管欧盟偶尔会在政策文件或联合声明中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这类表态通常具有高度中性与形式化，而非对中国内政或主权问题的实质干预，因此 2017 年以前的欧盟涉台政策整体上更接近于一种“单轨模式”。然而 2017 年以来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从战略克制转向战略介入，其在坚持传统“一中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强化

了对台湾的所谓“价值支持”与“实质互动”，从而使欧盟涉台政策出现“两面性”。

欧盟涉台政策的“两面性”主要体现为：一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嵌入越来越明显的“价值原则”，其涉台政策出现“双原则”特征。在这一时期，欧盟在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越来越强调与台湾地区的所谓“价值共鸣”，将台湾视为“亚洲一个可靠且值得尊敬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强调其与欧盟在“维护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1]等方面的共识。尤其是 2021 年以来，受美欧战略协同推动影响，欧盟在公开文件中强化对台湾地区的“价值认同和支持”。2024 年 2 月，欧盟—美国对华对话高级别会议联合声明公开表示，“欢迎台湾蓬勃发展的民主进程”，“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2]这种将“价值原则”引入涉台议题的做法，实质是借价值规范之名干涉中国内政，不仅模糊了“一中原则”的政治界限，也削弱了其在涉台事务中维持政治克制的基本立场。

二是在承诺不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的前提下，拓展双方的实质接触与合作空间。相较于过去在涉台事务中保持克制与低调，欧盟在延续其官方立场的同时，开始不断公开强调推进对台实质合作与交流。2021 年，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在欧洲议会针对涉台决议发表讲话时表示，欧盟有意在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与合作。^[3]2022 年 9 月，博雷利在欧洲议会关于台湾问题的辩论中表示，一个中国政策并不妨碍欧盟坚持并加强与台湾的合作，也不妨碍欧盟对近期紧张局势升级表达关切。^[4]这种政策两面性使欧盟在处理涉台事务时有了更大操作空间，也为个别成员国“灵活调度”与台湾地区的交往留下可乘之机。例如 2023 年 3 月，捷克总统当选人彼得·帕维尔（Petr Pavel）创下欧盟成员国准元首与蔡英文通话先例，对此欧盟发言人仅回应称，“一个中国政策并不阻碍欧盟与台湾深化交往”。在此背景下，欧盟与台湾地区的互动模式呈现出实质性扩展趋势，欧盟与台湾地区实质关系的发展冲击着传统“一中政策”框架的基础，增加了中欧之间政策摩擦和战略互疑的风险。

（二）将台海安全纳入欧洲安全战略框架，涉台政策走向“安全化”

在 2017 年以前，欧盟对台湾问题的安全维度关注较为有限，其在涉台问题上的安全考量主要体现为被动回应台海紧张态势、呼吁对话与和平解决争端，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措施”等政策表述。此类表述虽涉及地区安全议题，但多停留于政治宣示层面，并未上升至欧盟整体安全战略的优先范畴。这种相对低调的姿态既反映了欧盟地缘距离与战略重心所限，也体现出其外交政策以经济合作为主、安全关切为辅的基本逻辑。总之，

[1] EEA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aiwan,” May 10, 2024, 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european-union-and-taiwan_en?s=242#9002.

[2] EEAS, “EU-US: Consultations between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Secretary General Stefano Sannino and United States Under Secretary Victoria Nuland,” February 23, 2024,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us-consultations-between-european-external-action-service-secretary-general-stefano-sannino-and-0_en.

[3] European Parliament, “EU-Taiwan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debate),” October 19, 20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CRE-9-2021-10-19-ITM-009_EN.html.

[4] EEAS, “Taiwan: Remarks by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Josep Borrell at the EP Debate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September 13,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taiwan-remarks-high-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josep-borrell-ep-debate-recent-developments_en.

传统阶段的欧盟虽意识到台海局势对地区和平的潜在影响，但并未将其纳入欧盟的安全战略范畴；对涉台安全议题更多体现为作为旁观者对地区潜在安全风险的忧虑与防控，而非自身安全战略中需要主动介入的问题。

然而，2017年以来欧盟逐步突破传统的非介入姿态，日益重视台海安全议题，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方式改变现状”纳入其安全战略，公开声称台海和平稳定关系着欧盟的安全与繁荣。如2023年4月16日，博雷利强调欧洲经济高度依赖台海，台海和平与稳定是欧洲利益所在；同年6月，欧洲理事会首次将对台海情势的立场写入27国峰会结论，表示“反对任何以武力胁迫改变台海现状”。随着欧盟对台海安全议题关切的提升，其安全战略文件中的涉台“安全性”内容不断被强化。2025年《欧洲防卫白皮书—2030战备计划》（White Paper for European Defence—Readiness 2030）将台海局势列入欧盟战略安全评估，明确指出台海现状变化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后果，显示欧盟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趋势不断增强。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欧盟逐渐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与“支持维持台海现状”相互替代使用。例如2023年10月，博雷利发表的“中欧关系”专文中，强调欧盟支持维持现状，认为中国不应以胁迫或武力破坏现状，呼吁双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1]这一表述看似强调台海和平，实则概念上混淆了“台海现状”的本质。“台海现状”指的是“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现状，但民进党当局将其扭曲为“两岸互不隶属”的现状；而美国则在“和平”的幌子下将其歪曲为“和平稳定”的现状，实则为支持“两岸分裂”的现状。当前欧盟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支持维持现状糅合在一起，追随美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叙事，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不仅模糊了台海现状的本质，也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综上，欧盟将台海安全纳入欧洲安全战略框架，既体现出其强化外部安全布局的政策诉求，也意在为其介入台海事务提供政策依据与“正当性”支持。

（三）欧洲议会频繁挑衅一中原则红线，涉台政策表达“激进化”

在欧盟传统涉台政策结构中，欧洲议会虽具有较强的表达功能，但其对外政策并不具备直接决定力，涉台立场更多体现为附属于欧盟共同对外政策体系之下的议会意见表达。从历史发展实践看，2017年以前，欧洲议会在涉台事务上的表现总体较为克制，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的主流立场基本保持一致，并无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实质性行为。然而，2017年以来，欧洲议会对台政策逐步趋于激进，甚至一再越界，成为冲击欧盟“一中政策”的一大变数。首先，在政治互动层面，第九届（2019—2024年）欧洲议会高层议员与台湾地区的接触显著增多，代表团窜台频率创下新高。例如欧洲议会“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委员会”自2021年开始组织官方代表团窜台，迄今已持续四年；而副议长级别的连续窜台行为更是突破此前惯例，形成实质性政治互动网络。其次，在政策支持层面，欧洲议会通过的涉台决议数量快速增加，内容日益激进，不仅频繁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行动进行谴责，且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等决议侵蚀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试图推动欧盟对台政策的范式转变。最后，在国际支持层面，欧洲议会议员频繁借助“福尔摩沙俱乐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等平

[1] EEAS, “EU-China Relations: a Candid Exchange on our Differences,” October 20, 2023,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china-relations-candid-exchange-our-differences_en.

台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通过联署、声明、组织国际会议等方式推动台湾地区参与 WHO 等国际组织，并以“民主价值”框架重构欧盟涉台政策话语基础，试图将台湾问题从中国主权范畴引导至国际价值范畴，进一步撬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

2024 年选举产生的第十届欧洲议会在涉台政策上则更为激进，“亲台”力量的联合表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与密度。2024 年 10 月，新一届欧洲议会通过首份涉台“时事议题决议”（RSP）——“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 2758 号决议的错误诠释及其对台军事挑衅”，由议会内部欧洲人民党（PPE）等 7 个主要政治党团联合发起。相较于往年主要由个别议员或特定党团提出的“立法倡议报告”（INI），“时事议题决议”最大特点在于由议会内部多个主要党团联合发起，相关发起党团合计在本届议会共拥有 603 席，占全部 720 席的 83.8%，反映出当前议会内“亲台”立场的广泛政治基础。回顾 2019 年至 2024 年期间的第九届欧洲议会，尽管也有多份涉台 RSP，但在党团联合广度上不及 2024 年 10 月的这份决议。这一趋势表明，涉台议题正在欧洲议会内部获得前所未有的制度性支持与政治“正当性”，“挺台”议程已不再局限于个别党团的政策宣示，而是形成跨意识形态的政治联合体，并借助议会机制持续对欧盟整体涉台政策进行“试探性推动”。其背后不仅隐含对传统“一中政策”范式的突破意图，也在实质上为欧盟未来可能的政策松动构建舆论基础和“合法性”预期，而这对中国主权立场在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性构成了系统性挑战。

（四）欧盟成员国涉台政策出现分化，个别国家成为“挺台急先锋”

欧盟内部涉台政策的分化不仅表现为欧盟议会的激进立场与欧盟政府层面的“一中政策”不同步，还表现为部分成员国与欧盟政府层面涉台政策的不一致。在 2017 年之前，欧盟成员国在涉台问题上的立场总体上保持一致，较为严格地遵循欧盟层面确立的“一中政策”框架。这种一致性源于欧盟对外政策机制的制度安排以及成员国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因此尽管不同成员国在建交公报的措辞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实践中基本尊重欧盟统一立场，并在官方往来、协议签署、国际场合表态等方面保持克制，避免触碰中方所划定的政治红线。这种政策协调机制确保了欧盟整体在涉台问题上的一致性，也构成传统欧盟涉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欧盟涉台政策出现明显的内部分化趋势，成员国在涉台立场上的一致性受到挑战。这种分化一方面体现在欧盟传统大国对台立场的策略性调整，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部分中东欧国家突破既有政策边界，成为欧盟内部“挺台急先锋”。

2017 年大国关系变化以来，欧盟传统大国德国和法国虽遵循“一中政策”框架，但在战略文件与外交表态中都强化了涉台安全内容，例如 2023 年德法分别在中国战略报告和“七年建军法”等官方文件中强化涉台表述，将“自由航行”与“台海稳定”纳入印太战略考量。2025 年 4 月 9 日新上任的法国外长让-诺埃尔·巴罗（Jean-Noel Barrot）于国会就台湾议题发言时称，法国高度重视台湾周边自由航行权与台海稳定，反对单边改变台海现状；强调目前虽尚未有政府官员访台，然而法国与台湾地区的官方机构交流密切。^[1]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欧盟传统大国在涉台事务上已从此前的“克制顺应”逐步转向“策略调适”，以弱化一个中国原则

[1] 曾婷瑄：《法外长：与台交流密切 反对中国武力胁迫改变现状》，台湾“中央社”，2025 年 4 月 10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504100421.aspx>。

的政治约束力。除了法德涉台政策的策略性调整外,部分中东欧国家则率先突破既有政治边界,在政治、经贸等领域全面推进与台湾合作,成为“亲台—挺台”急先锋,直接冲击欧盟“一中政策”框架。例如,立陶宛自同意与台湾地区互设代表处以来,持续推进对台政治与经贸关系,称与台湾的贸易关系是当局的“策略优先要务”之一;捷克则多次组织高层代表团窜台,并出现准元首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的错误先例。这类实质性政治操作不仅打破了以往欧盟成员国涉台事务的克制惯例,也为欧盟内部对台立场的分化提供了“样板”,构成对欧盟统一涉台政策的直接冲击。总体来看,欧盟成员国涉台政策正由过去的基本政策协同转向立场多元化和操作自主化。这种分化趋势不仅加剧了欧盟对华政策的内部张力,也使中国在应对欧盟涉台态度时面临更为复杂与不确定的局势。

(五)在美欧战略协同中强化涉台立场与行动,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联动”

大国博弈背景下,欧盟涉台政策的变化还体现在对美国政策主张的呼应,配合美方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一是配合美国的涉台立场和议题推进。近年来,欧盟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国在涉台立场上的趋同性日益增强,特别是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与“联大 2758 号决议不涉台”的政策议题上形成密集协同。例如,2023 年 10 月,美欧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表达了对台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强调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1]同年 11 月,欧盟与加拿大也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对台湾海峡局势的严重关切,明确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2]与此同时,欧盟逐步跟进美国有关“联大 2758 号决议不涉台”的政治主张。2024 年 10 月,欧洲议会以 432 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当诠释联大 2758 号决议及对台湾持续军事挑衅”决议案,散播“联大 2758 号决议未解决台湾地位”等谬论。在此决议案表决前,欧盟委员会就业与社会权利委员尼古拉斯·施密特(Nicolas Schmit)在全会辩论时表示,联大 2758 号决议文内容中“台湾”一词并未出现,这是欧盟行政层面首次就该决议表态,反映出其在敏感涉台议题上迈出政策转向的重要一步以及在涉台政策上正日益接近美方立场,形成政策协同。

二是追随美国的印太军事步伐,增强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感。近年来,欧盟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不断拓展安全参与维度,逐步加强与盟友在亚太地区的防务合作。例如,2024 年 11 月,欧盟与日本召开首次欧日外长级战略对话,宣布建立正式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明确表示加强双方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与对话。与此同时,欧盟部分国家亦呼应美国,加强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赖清德上任后,相继有荷兰、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以“自由航行”为借口,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2024 年 9 月,德国时隔 22 年再度通过台湾海峡,且时任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等政府高官公开指称台海是“国际水域”。上述行为表明,欧盟正逐步通过与美国及印太盟友的安全政策联动,配合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

[1] European Council, “US-EU Summit Joint Statement,” October 20,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67448/us-eu-statement-final.pdf>.

[2] “MOFA Welcomes Joint EU-Canada Statement on Strait,” *Taipei Times*, November 26, 2023,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23/11/26/2003809727?utm_source=chatgpt.com.

三、大国博弈下欧盟涉台政策变化的影响因素

大国博弈下欧盟涉台政策变化显著,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多维度的。其中,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缘政治压力是直接诱因,大国格局变迁下的中欧结构性利益冲突是深层动因,而欧盟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以及欧洲内部政治极化则是重要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层面共同作用,使得欧盟不再将台湾问题视为单一的地区性政治议题,而是将其纳入更广阔的战略框架中,进行多层面和多渠道的议题联结,从而推动其涉台政策由“克制”转向“介入”。

(一) 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缘政治压力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以来,该战略逐步发展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核心政策架构,其通过强化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关键国家的合作,构建起对华竞争的地缘战略格局。在这一政策架构下,台湾问题被赋予了更强的战略意义,成为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仅延续了前任政府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更进一步强化该战略的联盟导向,系统性地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试图将台湾纳入其主导的印太地缘政治议题体系之中,将其塑造成美西方对华竞争的“价值象征”与“安全焦点”。在美国持续将台湾问题工具化、不断拉拢盟友在该议题上形成政策共识的背景下,欧盟的涉台立场亦随之发生显著调整。为回应美国的战略诉求、巩固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及提升全球战略能见度,欧盟于2021年9月发布《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宣称台海局势对欧洲安全与繁荣具有“直接影响”。

正是在美国的地缘安全战略驱动下,台湾问题在欧盟政策议程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欧盟愈加密集地提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政策诉求,并通过一系列官方文件和高层表态凸显其对台湾问题的关切。2023年2月,欧盟理事会秘书处的分析团队发布《欧盟:从海上角色到海上力量》(The EU: From Maritime Actor to Sea Power)报告,首次将台湾海峡纳入欧盟九大全球战略海域之列,强调该区域在欧洲安全、经济发展、贸易连结、食品和能源安全等多重维度中的关键作用。^[1]次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中欧关系演说时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称“亚洲是世界上成长最快速的区域,任何削弱该区域稳定的行为,均影响全球安全、自由贸易及欧盟在该区域利益”。^[2]2024年10月底,欧盟委员会出台“强化欧洲军民准备”(Strengthening Europe's Civilian and Military Preparedness and Readiness)战略文件,再次宣称所谓“中国‘侵略’台湾的潜在经济和安全影响对欧洲和世界来说是惊人的”,并提出要与台湾合作,应对因地缘政治恶化所引发的混合威胁。^[3]这类政策认知的表述,与美国近年来强调台海安全对全球供应链稳定和西方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不谋

[1]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General Secretariat, “The EU: from Maritime Actor to Sea Power,”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62172/art-paper-the-eu-from-maritime-actor-to-sea-power-web.pdf>.

[2]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March 30,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063.

[3] Sauli Niinistö, “Safer Together, Strengthening Europe's Civilian and Military Preparedness and Readiness,”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5bb2881f-9e29-42f2-8b77-8739b19d047c_en?filename=2024_Niinisto-report_Book_VF.pdf.

而合。可见，欧盟已不再将台湾问题视为纯粹的地区性事务，而是将其纳入更广义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之中，作为衡量欧盟“联盟忠诚度”的一个重要议题。这种政策议程升格的背后，体现了美国在构建对华战略联盟过程中对欧盟所施加的制度性牵引与话语重塑作用。

（二）竞合战略下中欧的结构性利益冲突

利益是政治行为体对外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这是由其决策中的现实主义导向所决定的。中欧建交以来，欧盟建立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政治基点的涉台政策框架正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一方面，基于欧洲统合目标、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需求，欧盟需要一个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稳定的中国；另一方面，欧盟与中国在地区性事务和全球性事务的共同利益超越台湾问题。^[1]是故，长期以来欧盟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官方关系，并在中欧关系中淡化台湾问题。然而2017年以来，国际政治格局进入“大国竞争时代”，欧盟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由过去强调“务实合作”逐步转向“合作—竞争—防范”三位一体的结构。而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叠加影响则暴露了欧盟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单一依赖”问题，增强了欧盟的经济安全意识，推动欧盟开始重估自身的产业安全与技术韧性。为此，其在经济安全与技术自主性方面加快布局，陆续出台《经济安全战略》（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关键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等战略文件，推进外国直接投资筛选机制改革，着手建立对外投资审查与统一的出口管制体系，并修改氢能项目的招标规则，从政策、法律和产业多个维度推进对华“去风险”，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升级为对华战略的核心内容。可见，当前欧盟的对华政策以经济安全为中心，其不再单纯的将中国视为一个有前途的合作伙伴，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潜在的风险和巨大的挑战，其对华政策由原来的“互补型合作”转向“安全型竞争”，政治与经济目标之间的张力增强。

与此同时，中欧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在以中美为主导的新一轮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欧盟面临“高科技边缘化”的压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当前全球一半的数据中心集中在中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投资也高度集中，欧盟在市场份额、技术标准 and 平台竞争力上均处于劣势。^[2]尤其在半导体、高性能计算、大数据处理等核心环节，欧盟对中国数字产能的依赖程度居高不下。以数字产业链关键原材料为例，2023年冯德莱恩在讲话中披露，欧盟98%的稀土、93%的镁和97%的锂等关键资源依赖中国进口。^[3]这些原材料广泛用于芯片、电池、人工智能设备等战略性产业，是支撑欧盟绿色与数字转型的核心基础。此外，在供应链加工环节，中国企业在稀土提炼、磁性材料加工、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生产等领域具备不可替代的技术与产能优势。面对中国的数字优势，欧盟的“压力感知”和“安全感知”增强，进而驱动其对华战略进一步向竞争方向倾斜。中欧关系的上述变化亦是欧盟重新评估其涉台政策的重要原因。鉴于当前台湾地区在全球数字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欧盟试图通过

[1] 郭建平主编：《冷战后美日欧盟与台湾关系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

[2] UNCTAD,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1*, September 29, 2021,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digital-economy-report-2021>.

[3]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March 30,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063.

强化与台湾地区的经济联系,以维护其在印太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因此,欧盟在公开文件和高层表态中不断强调“维护台海现状符合欧盟的直接利益”,并开始在贸易、技术等多个层面拓展与台湾地区的联系,实质性介入台湾问题。可见,台湾问题不再仅是地缘政治敏感议题,而是成为欧盟调整对华关系和提升经济韧性的战略杠杆,欧盟涉台政策的调整也因此进一步深化。

(三) 欧盟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

在 2017 年欧盟对华战略调整之前,欧盟强调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因而在价值观议题上相对克制,避免因价值观分歧影响中欧关系。然而,随着 2016 年对外政策中“有原则的实用主义”理念的提出,欧盟尝试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重塑其“规范性大国”角色,其对华政策从原先的强调利益转向兼顾价值与利益的统一。在这一总体战略思路引导下,欧盟对外政策愈发突出意识形态色彩,并逐渐将意识形态战略化。因此,在欧盟对华战略转向“竞合”后,其对外外交中的价值观因素被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不仅将对华政策与其内部价值规范相联系,也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议题相绑定。2019 年《欧盟—中国:战略展望》(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强调,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存在必须伴随着更多责任,特别是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更大的互惠和开放方面。欧盟同时表示将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全欧盟”(whole-of-EU)方式,以“有原则地捍卫利益和价值观”。^[1]

2021 年拜登上台后在联盟政治导向下构建对华竞争“统一战线”,加强与盟友的政策协调,谋求维护“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战略共识。作为西方世界的核心成员,欧盟积极响应,强化其在美国主导的“价值同盟”中的角色。早在拜登候任时期,欧盟委员会就发布《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认为欧美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国家,都认识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自信所带来的战略挑战,并称欧盟将更加关注印太地区的挑战和机遇,与美国密切合作,“使我们的战略目标一致,并支持亚洲的民主进步”。^[2]2021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又通过《加强欧盟对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的贡献》(Strengthening the EU's Contribution to Rules-based Multilateralism)联合通讯,指出欧盟将通过推动全球和平与安全、捍卫基本权利和国际法、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挑战等方式,加强对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的贡献,并强调多边主义必须有效、公平且能产生服务于欧盟和全球利益和价值观的结果。^[3]正是在强化对外价值观外交的背景下,对台湾地区的“价值支持”成为欧盟对华价值观外交的一部分。加之 2016 年以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强化对欧盟的“价值传播”,进一步催化了欧方对台湾“价值认同”的加深。因此,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过后,欧盟发言人就选举发表声明表示祝贺,称欧盟和台湾地区“各自的治理体系建立在对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共同承诺之

[1]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March 12, 2019,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ystem/files/2019-03/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2] 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December 2, 2020,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da473743-1205-45c3-a558-87d0bf356cbd_en?filename=joint-communication-eu-us-agenda_en.pdf.

[3]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Strengthening the EU's Contribution to Rules-based Multilateralism,” February 17, 2021, https://www.ec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n_strategy_on_strengthening_the_eus_contribution_to_rules-based_multilateralism.pdf.

上。”^[1]可见，在自身“规范性力量”角色重塑以及美欧“价值同盟”驱动下，欧盟日益倾向于以价值观为纽带强化与理念相近实体的联系。台湾被视为“民主价值共同体”中的一员，成为欧盟彰显其意识形态立场、推行对华价值观外交的重要体现。

（四）欧洲内部的政治极化

受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袭击频发与经济发展萎靡等多重冲击的叠加作用，欧洲社会对主流政治力量信任度下降，政治呈现日益“极化”的现象，激进左翼与极端右翼崛起成为显著特征。^[2]2017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动荡下，欧洲社会的政治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其中极右翼政党在国家政策议程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推动了欧洲政治版图的右倾化趋势。这些极右翼政党在移民、经济、文化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主张国家主权至上，反对欧盟的“超国家化”倾向，反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主张强硬的对外政策，进而对欧盟对华政策产生影响。例如，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上任后一直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强烈批评态度，称其为“一个重大错误”，并导致2024年意大利正式退出。又如，法国极右翼政党党魁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曾公开表示要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爆发后，部分中东欧国家长期存在的“反俄反共情结”被激活，美国则趁机利用安全议题歪曲中俄关系，煽动这些国家搅局台海，推进与台湾地区实质关系的发展。

在民粹主义崛起和政治极化加剧的背景下，欧洲议会内部的党派分歧不断加深，而涉台议题却成为议会内部少有的“超党派工具”。愈发激进的意识形态倾向使得许多议员在涉台立场上趋于“政治正确”，借助“亲台”言行获取曝光机会与政治红利，从而实现“刷存在感”与提升议会能见度的目的。例如，2021年11月，“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率领欧洲议会首个官方代表团窜访台湾并向台湾表达支持，这一行为不仅使其在欧洲政坛和媒体上获得广泛关注，还巩固了其作为对华强硬派的形象，同时也为其在2024年顺利连任议员打下基础。在这种“行为示范—舆论塑造—政治激励”的循环机制中，涉台议题逐步演化为一个可供复制的“政治表现路径”。随着该模式通过议会内部互动机制不断扩散，形成了关于涉台议题的“议会极化”“正反馈链条”。与此同时，欧洲议会主流党团对华政策偏好趋于一致，日益强调“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对华外交立场。2021年3月10日，欧洲议会最大的党团欧洲人民党党团就通过首份对华政策文件，认为中欧关系的核心在于价值观，提出欧盟的对华政策应基于“尽可能合作、需要时竞争、必要时对抗”的原则，主张加强“原则性”和“务实性”。^[3]正是在对华“价值观外交”的影响下，欧洲议会主要政治党团在涉台问题上形成“政治趋同”与“跨党团合作”格局，推动欧盟涉台政策进一步政治化、工具化，并日益成为欧盟内部政治极化和政策偏好交织影响的集中体现。

[1] EEAS, “Taiwan: Statement by the Spokesperson on the Elections,” January 13, 2024,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taiwan-statement-spokesperson-elections-0_en?s=242.

[2] 史志钦：《多重危机下的欧洲政治社会极化趋势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3期，第6页。

[3] EPP Group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U-China Relations-Towards a Fair and Reciprocal Partnership,” March 10, 2021, https://www.eppgroup.eu/download/file/5IRMWHClusM1ktrQYVBeN_WEu9es9j1lead0cQWK5YVyJZIsc9br021gPaouAAAACEQU0NzcyNQ.

四、大国博弈下欧盟涉台政策变化的影响

虽然当前欧盟未显露突破传统“一中政策”框架的政策意图，但其日益积极介入台湾问题的言行事实上正在模糊传统“一中政策”框架的边界，这直接增加了中欧在台湾问题上摩擦和冲突的风险，助长了“台独”势力的气焰，同时也对国际社会产生负面的示范效应，影响了台海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一）模糊欧盟传统“一中政策”框架，增加中欧冲突风险

2017 年以来，尽管欧盟在官方层面仍坚持“一中政策”，但其在多个政策文本中刻意凸显台湾的“伙伴地位”和“战略重要性”，并在实际行动中不断试探政策边界，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实质性模糊了“一中政策”的边界。而欧洲议会的“激进”行径和部分欧盟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退变更是使一个中国原则遭遇边缘侵蚀与磨损，降低了欧盟政治承诺的可信度。2023 年 2 月，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在欧洲政策中心发表讲话指出，欧盟的一些行为，如议员窜访台湾、讨论与台湾签署投资协议，已直接违背了欧共体在 1975 年中欧建交时做出的承诺。他警告称：“如果这些承诺被违背，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或动摇双边关系的基础。”^[1]2025 年 4 月，国台办发言人针对欧盟与 G7 涉台言论表示，一些国家嘴上说着关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实质是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有关国家如果真的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就应该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旗帜鲜明反对“台独”。^[2]可见，欧盟涉台政策变化加剧中欧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张力，增加了中欧政治冲突的风险。

（二）向民进党当局发出不当信号，助长“台独”势力妄想

欧盟虽然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其追随美国强化“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诉求和对“维持台海现状”的错误解读，模糊了台海现状的本质，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而欧盟大国在台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如德国宣称要在印太地区强化军事存在、法国扬言捍卫在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权”等，不仅直接给台海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更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令民进党当局更加肆无忌惮。2024 年 11 月，赖清德在“投资欧盟论坛”致辞时表示，台湾希望与欧盟一起打造更强健的“民主保护伞”，构建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并推动与欧盟洽签“经济伙伴协定”（EPA），反映出民进党当局试图借助欧盟力量进一步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层面推动“台独”实践。

（三）产生负面的国际示范效应，不利于台海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欧盟从战略克制转向战略介入的涉台政策的变化可能被其他国家视为介入台湾问题的样例，从而诱发更多外部势力的干预，进一步复杂化台海局势。这不仅会削弱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共识，也将动摇地区安全架构的稳定性，增加冲突风险。此外，近年来，欧盟将台海地区纳入其防务战略视野，明确将台海安全视为欧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相关白皮书中予以体现。这一做法不仅为其加强在台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寻找借口，也释放出扩大军事影

[1]《傅聪大使：违背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将从根本上动摇双边关系基础》，2023 年 2 月 11 日，https://eu.china-mission.gov.cn/stxw/202302/t20230211_11023841.htm?utm_source=chatgpt.com。

[2]《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辑录》，2025 年 4 月 16 日，http://www.gwyttb.gov.cn/m/speech/202504/t20250416_12695846.htm。

响力的信号。未来，欧盟可能进一步推动与印太国家的军事合作，参与构建印太地缘军事新格局。由于台湾地区在地缘战略中的特殊位置与高度敏感性，势必成为此类博弈的核心焦点。如果大国竞争缺乏有效调节机制，且欧盟等外部势力持续介入，台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将更趋复杂。

结 语

综上所述，受印太地缘政治压力和对华战略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欧盟不断强化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与干预，加强与台湾地区的联系和实质支持，使得台湾问题中的“欧盟因素”逐步凸显。从 2024 年下半年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产生以来，不难发现，当前欧盟的涉台政策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量变，其涉台政策的“价值性”和“安全性”底色呈现强化趋势，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与现状”亦继续成为欧盟涉台政策的核心政策诉求和行动指南。欧盟与台湾地区关系的走近将增加台湾问题中大国因素的复杂性和台海安全风险，亦给未来中欧关系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不过，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欧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特朗普关税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会增加欧盟在中美之间的政策徘徊与欧盟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这也意味着未来欧盟在台湾问题上将会延续传统的“一中政策”框架，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力度有限。尽管如此，对于欧盟的涉台政策的进一步变化仍需持续关注，以便能及时化解欧盟涉台政策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 金 奕）

From Restraint to Intervention: The Shift in the EU's Taiwan Policy Amid Great Power Rivalry He Daru

Abstract: Since 2017, the European Union's Taiwan-related polic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strategic restraint to strategic engagement. While the EU still adheres to the traditional "One China Policy" framework, it has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value-based support" and "substantive interactions" with Taiwan, contributing to the securitization of its Taiwan policy and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aiwan ques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expressions have become more radical, with some member states even emerging as outspoken supporters of Taiwan. This policy shift results from geopolitical changes driven by great power rivalry, structur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and internal political polarization within Europe. The evolution of the EU's Taiwan policy erodes the edge of its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sends misleading signals to the DPP authorities. It also risks generating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Europ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dermin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Taiwan; Great Power Rivalry; Strategic Intervention